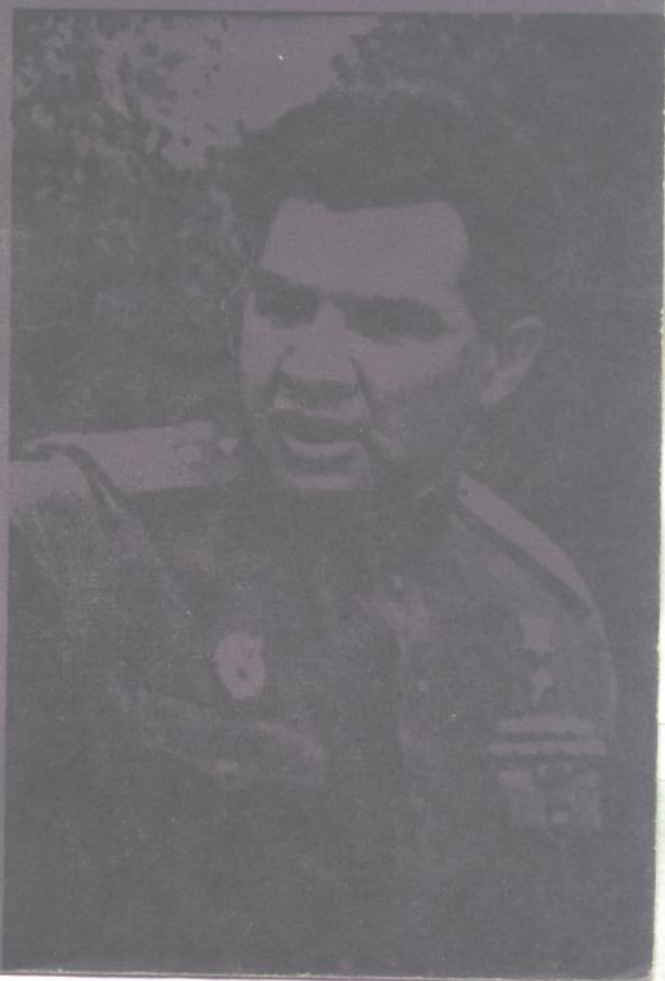


崔可夫战争回忆录

赵云峰 吴蕴辉 译



ZQ69/04

崔可夫战争回忆录

——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

(下)

〔苏〕В·И·崔可夫著

赵云峰 吴蕴辉 译

※

军事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红山口甲三号)

石油部管道局印刷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 13 $\frac{15}{16}$ 字数301,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5350·30 定价3.12元

目 录

(下册)

第二部分 解放乌克兰的战斗 1

第十一章 在北顿涅兹河 1

第十二章 扎波罗热、尼科波尔、敖德萨 45

第三部分 在主要方向上 133

第十三章 新的任务 133

第十四章 在马格努塞夫登陆场上 192

第十五章 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

第四部分 攻克柏林 310

第十六章 在塞洛高地上 310

第十七章 在攻克柏林的日子里 332

第十八章 战士的幸福 423

附 图 437

第二部分 解放乌克兰的战斗

第十一章 在北顿涅兹河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通往柏林的道路就在眼前了。当我设法了解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发生的事件时，不禁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起往事。这些回顾使我确信，当苏军战士撤退到斯大林格勒接近地时，在思想上就明确地显 露出 巨大的转折——决不再继续撤退。

苏联军队这种思想上的转折，虽然是用眼睛看不到的，但德寇的将军和军官们却能感觉到。

我做为原第62集团军的司令员也可以完全负责地说，斯大林格勒只有在一种条件下可能被敌人占领，那就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全部牺牲。我们当时曾向党和人民发过誓言：“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除非英勇牺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实现自己的誓言。此种信念，不但是出于对战略形势的理解，也是出于对坚守斯大林格勒必要性的认识。苏军战士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在我们集团军已经发生。它是这种信念的具体反映。

《红星报》在1942年12月1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第62集团军的坚定性已经震惊世界，第62集团军的行动，使得我们的指挥部能积蓄力量，转入进攻，并使法西斯德国军队遭受惨败。”

在这篇社论中继续写道：

“第62集团军的光荣将流芳百世。若干年之后，这块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上，将绿草如茵。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城内，宽敞明亮的楼房将拔地而起。我们的老战士将会自豪地说：

‘是的，我当年曾在光荣的第62集团军的旗帜下战斗过！’”

我当时的心境与激情是容易理解的。我想，为胜利而自豪，这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不过，决不能因为胜利，而疏忽大意。否则良心上要受到责备的，要知道，那时候在包围圈里还有敌人的22个师和160个独立部队（总共33万人）有待于我们去消灭。而且随着包围圈的缩小，敌人更是困兽犹斗，凭险抵抗，同时还一心指望“顿河”集团军群能集中大量坦克打开一条通道，为他们解围。当时我一直放心不下，忐忑不安的道理就在这里；我当然完全相信，通过大规模的交战，敌人定会被全部粉碎；不过曼施泰因万一打开合围圈，与保卢斯的军队合为一股；那么我们不知还要费多大力气，第62集团军还将会经受多大的考验？

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担心，况且对于这个问题，有各式各样的议论，不但当时有，过很多年之后，也有不同的议论，而且各阶层都有。例如，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10年之后，即在1952年夏天，我竟有机会同斯大林对这个问题交换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索契休养，午饭后电话铃响了。

“您是崔可夫同志吗？”

“是我呀！请问，谁要找我讲话？”

“我是波斯克别贝夫，斯大林同志准备同你讲话。”

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心里有些紧张。不一会儿，我听到电话里传来讲电话声，声音不大，很平静，带有格鲁吉亚人的口音，一听就知道是斯大林。斯大林问道：

“休息的怎么样，崔可夫同志，感觉如何？”

“休息的很好，感觉也不错。”我回答。

“您能到我这来一下吗？”斯大林问。

“听您吩咐，斯大林同志！我随时都可以去！”

“马上派车去接您。请您来吧！您要知道，这是邀请，不是命令！”

我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简单收拾了一下。车子来了。车子走了不长时间，斯大林走出来在门口迎接我，我下了汽车，走到他跟前，按晋见的礼节向他报告，并行举手礼：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吩咐来到。”

他轻轻地把我的右手从帽檐上拿下，对我说：

“为什么这样郑重其事？还是简单点吧！”

“是，斯大林同志。不过，我这样做习惯了。”

斯大林微微地笑了笑。

“既然是习惯了，那我就没话可说啦！”

我们穿过一个大房间，走进一个台球室。斯大林问了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这时我正担任苏军驻德集团总司令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

晚餐是在凉台上吃的。这种无拘无束的安排，倒使我能畅所欲言。我不慌不忙地回答着斯大林提出的问题，他在谈起斯大林格勒会战时，突然话锋一转，向我问道：

“崔可夫同志，要是当初把曼施泰因集群放进斯大林格勒，把他们同保卢斯加在一起，一下吃掉行不行？请说说您的看法。”

在当时，在斯大林格勒交战的日子里，我倒是想过这种可能性，因为我当时不能不对此有所准备，准备敌人的解围。坦率地说，关于制止霍特的坦克群突破合围的对外正面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抱十分的希望。“顿河”集团军群也可能突入斯大林格勒。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敌人为了保卢斯集团军突破包围圈，进一步制止我封闭突破口，使我们关不上大门。

当时，对于一点，我很清楚，就合围本身来讲，天衣无缝的合围在军事历史上是罕见的。我心里明白，把一个集团军放进斯大林格勒，我们决不会冒这个风险的。

会不会出现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曼施泰因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后，给被围部队补充兵力，并鼓励他们同自己一起突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被牵制的时间会更长，同时，要歼灭这么大的兵力集团（而且这些人还会拼命挣扎），不但困难很多，而且战斗会拖得很久。

我根据自己这些想法，一一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问题。

斯大林长叹了一口气，开始沉思起来，他静静地说：

“是啊，这样太冒险。不能干那么冒险的事！人民对于和平已经急不可待。”

他站起身，在凉台踱了一圈儿，然后坐下来，把烟头点燃，突然向我问道：

“崔可夫同志，请您告诉我，何谓被围之敌？”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又不容易一下子回答好的问题。

题。我尽量捉摸隐藏在问题后面的意思，可是他不等我回答，便自己先做了回答，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如果被围之敌胆小如鼠，惊慌失措，那他肯定会不管突围条件如何，四处突围；如果被围之敌坚定顽强，那他定会死守到底。把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战例，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许多统帅都曾力争实现对敌人天衣无缝的合围，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这又是什么原因？当年库图佐夫未能合围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曾要求库图佐夫断绝法军退路，将法军团团围住，但是库图佐夫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法军撤退的行动比库图佐夫的追赶坚决迅速得多。在战争时期，自从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我曾多次设想过几个如何合围德军的方案。当我放弃这些设想时，想必人们还曾埋怨过我呢！提出实施合围战役设想的同志们，往往考虑不到这么几点：第一，自从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德军指挥部已经失去了耐心。当我们对敌人某一集团的两翼实施突击，形成包围圈时，他们就急忙撤出部队，摆脱陷入合围的危险；这样同时放弃了大片土地；第二，德军士兵对于在斯大林格勒遭到的惨败记忆犹新，不愿再陷入合围。如果一个士兵不愿遭到合围，那他总会有办法突出包围圈或及时进行退却的。德军士兵一发现有遭到合围的征候，马上便放弃阵地，进行退却，同时也给我们腾出来许多地盘。这也正好符合了我们应当完成的任务——把敌人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

我们的谈话一直到深夜1点才结束。斯大林把我送出门口。我们彼此告别了。

如今每当我缅怀过去，总觉得当今西德的一些历史学家和诸如曼施泰因之类的回忆录作者们，以及象曼施泰因那样

总是为“失去的胜利”而痛心疾首的人们，往往动辄歪曲事情真相，总是对无可争辩的事实置若罔闻。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围的有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部队，他们全部被粉碎，全部被歼灭。自从第6集团军被合围之后，在红军实施的各次进攻战役中，敌人又有5个集团军被全部粉碎。他们不是在被合围的条件下被粉碎的。他们是在战役广场，在野战条件下遭到粉碎的，而且当时具备实施广泛机动的全部条件，弹药和技术装备的保障也十分充足。

问题倒不在于合围。

假如当初曼施泰因突入了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而且保卢斯的集团军也通过打开的缺口突围而出，那么南方的形势以及第62集团军的处境会不会有多大改变呢？我认为，不会的。西德的一些军事学术理论家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Φ·梅伦京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第6集团军已经无可幸免，而且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挽救保卢斯。即使出现了某种奇迹，希特勒同意了他们突围的要求，这些精疲力尽、半饥半饱的军队，没有交通工具保障通过冰天雪地的大草原，开赴罗斯托夫，也会在行军过程中全军覆没。就象当年拿破仑的士兵们从莫斯科向别列津纳河进行大撤退那样。”①

是的，当初希特勒有意识地让保卢斯留在合围圈内，纯粹是出于战术、战役上的考虑，企图使用1个被合围的集团军拖住我们数个集团军。确实，希特勒赢得了时间，在高加

①Φ·梅伦京《1939年—1945年的坦克战》译自英文缩译本，莫斯科1957年版，第173页。

索突出包围圈，在伏尔加河牵制了我大批兵力，推迟了失败的时间，以便竭尽全力进行垂死挣扎。但其结局如何，这是世人皆知的。

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存在着一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集团军各部队人员在思想情绪上有了一个大转变，但是要使这种思想上的成果继续得到巩固，还必须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例如，领导必须产生合理的决心；要培养和训练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包括集团军司令部）在野战条件下实施进攻战斗的能力；要使他们摆脱在巷战中实施防御的经验束缚，能在更大的规模上组织部队进行机动。

实际上，前一阶段在一百五十多天里，集团军是在一条甚为狭窄的地带上实施的防御战。在当时的条件下，部队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摸索出一套完整的、十分适合那个具体条件的战术方法。人们已经习惯于在那块所谓弹丸之地作战，而且为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可是如今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将要在野战阵地条件下作战了，我们将要驰骋于广大的空间，空间之大，已经不是从前的几百米，而且数十公里。还要克服各种水障碍，要带领各团、各营通过旷野，通过谷地和高山。习惯乃是人的第二本能，它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得死死的，很不容易摆脱。摆在我面前的任务，说到家，就是要使指挥员的思维结构来一个根本的变化，彻底改变司令部的工作方法。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都是首先把自己摆到一个普通团长的位置；设想一下，如果我是一名团长，我能不能适应这种转变。

每到此时，在国内战争时期战斗生活中的个人经历，便起作用了。

那是在1919年，车里雅宾斯克战斗之后，高尔察克的部队狼狈逃过托博尔河。逃窜十分迅速，我军竟无法把他们追上。

我所指挥的步兵第43团，因屡建战功，曾被全俄执行委员会授予革命荣誉红旗。

不久，调来了一位新政委П·С·尤苏波夫，他原是邦久工厂的一名工人，比我年长15岁，具有很出色的组织能力，但是根本不懂军事。他来到后便对我坦率地说：

“你是指挥员，由你指挥吧！我只从政治路线上给予保障就是了。”

我很喜欢他这种坦率的性格。

我们翻过乌拉尔之后，前面便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平原。

高尔察克撤过托博尔河时，军队得到了补充。他向富裕的城市居民和哥萨克阶级进行征收。并指望他们能够坚决同红军作战。

高尔察克在命令中提出，只动员私有土地不少于50俄亩的农村人口入伍。

西伯利亚的宗教界全力支持高尔察克政权，其中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谢里维尔斯特十分卖力。在他的策划下组织了一个捧十字架圣像游行团，另外还有什么“祈祷和忏悔日”、什么“赐胜”祈祷、什么宗教呼吁、报纸、宣传小册子等等，一切都动员起来反对红军的进攻。高尔察克比较顺利地动员了大批哥萨克入伍，组建了1个军，共15个团，由于得到了英、美、法、日等国的军援，这些哥萨克简直武装到了牙齿。

红军的各个团队，转战一千余公里，已经精疲力尽。我们已深感弹药（特别是炮弹）缺乏。我们的处境确实十分艰苦，最说明问题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前线需要中央地区供应4万双鞋和包脚布（即袜子——译者）。

粮食供应依靠当地居民，居民们完全是站在红军一边的。

我们拿下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之后，东方战线进行了改组，编为两个方面军：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由M·B·伏龙芝指挥），编有第1和第4集团军；东方面军（由B·A·奥尔德罗格指挥），编有第5和第3集团军。后来第2集团军转移到南线。随该集团军一起转移的有亚晋的第28师，步兵第7师和步兵第21师的一部分。我同自己的团队留在东方面军。

第2集团军之所以必须去南线，是因为邓尼金的军队已经威胁到莫斯科。

东方面军的粮食、弹药、装备的补给越来越少，而且也不得再提要求。尽管如此，红军战士们的士气还是十分高涨，我们还继续向东进攻。各团在前进中的口号：

“快把西伯利亚交出来！”

库爾干是西伯利亚的大门。

在光荣的骑兵领袖托明率领下的红军骑兵大队，飞奔通过这座大门，然后北上，直指别洛泽尔斯克。我们在骑兵之后，也进入库爾干。

当天我们派出侦察兵，我们的侦察兵在托博尔河对岸，树林边缘前，遭到了敌人火力袭击。我当即判明，敌人企图坚守该城前面的有利阵地。我们的军队面前的任务是，强

渡托博尔河。为了摸清情况，防备万一，我亲自参加侦察，在城南不远的地方涉水过河。通过侦察和我自己的判断，敌人是决心在此地坚守。

斯特罗加诺夫根据师长的命令布置任务：

第45、第44团从两侧控制住库尔干——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并准备强渡托博尔河；第43团向南面，任务是强渡托博尔河，在铁路线以南向瓦尔加什车站进攻。

经过短时间休息之后，我团顺利地渡过了托博尔河，但却未能继续发展进攻。因为前面泥泞的沟渠和河岔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而且这时我们没有这个地区的地形图。到底有多少沟渠、河岔，流向如何，谁也说不出来。我准备亲自带领骑兵侦察员前去找能通过这个复杂地形的道路，但是没有成功。在一块河滩地我们遭到了敌人的伏击，牺牲了两名侦察员，我的马匹被打死。被打死的马陷在泥里，我的双脚又卡在了马蹬里，好长时间挣脱不出来，幸而雅可夫·别尔德尼科夫帮我摆脱了困境。这个人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他可以把身体贴在马肚子上驰骋。

我团停下来了，我不得不向旅司令部报告，说在这个地段上不能进攻。

第二天大清早，我带着传令兵和两名侦察员策马前往库尔干师的司令部。快到库尔干城时，我们听到了炮声，连着铁路大桥那边又传来了枪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友邻在实施进攻，于是我决定前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打的。

在库尔干东北郊是斯特罗加诺夫的指挥所以及各团团长的指挥所。

再往前走，库尔干以北，也传来了枪声，在那里，A·A·

萨宗诺夫在指挥我师第13旅进行战斗。

早晨8时左右，敌人的炮兵、装甲列车和机枪手一起开火，给我军造成重大伤亡。我军几次企图通过铁路大桥渡过托博尔河，均未成功。

我仔细研究了情况并进行反复思考之后，来到了旅长这里（各团团长也在场），我说：

“这样组织进攻，根本不行，只能造成伤亡。”

年轻人讲求坦率直爽，开门见山。可是旅长和各团团长却想不到我在他们面前却这样不讲求方式，因为他们都是基干军官，我在他们面前其实还是个小孩子。

“那你看怎么办？”旅长问我。显然我的话惹恼了他，他在生气，话音里已经带出来了。

“敌人的火力很密集，控制着每个灌木丛，每个小土岗，敌人的主要火器都集中在这里，如果不压制住敌人的炮兵是不行的。另外，我们不能在白天进攻……”。

最后，我对旅长说，如果他允许的话，我团将于明日午饭前强渡托博尔河，占领对岸的林区，并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

我这种自信的态度，使老同志们很难为情。他们脸上的表情已经很不自然。当时旅政委戈里亚奇金也在场，但他一直没有讲话。当我离开那里，前往师司令部时，他骑马赶上了我，用责备的口气问我：

“你为什么要伤这些老同志的脸面？难道他们不想消灭敌人？”

我也充满怒气地回答：

“光有愿望，那不行。我是出于好心。我为什么要凭白无故地伤害同志呢？”

“那好”，他以谅解的口气说，“你说话算数，明天一定要粉碎敌人，强渡托博尔河，进到树林的东边，是不是？”

我的主意在同旅长谈话之前，就考虑成熟了，于是痛快地回答他，只要允许我按自己的办法去打，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保证，一定能打胜。

戈里亚奇金再没有问我一句话。我们一起策马前往师司令部，我去找师长，他到政治部去了。

师长卡尔波夫热情地接待了我，可能我这次来晋见他是衣冠楚楚的缘故。他详细地询问了我团所在地段的情况。我十分坦率地一一作了回答。

这时师政委加比舍夫走进屋来，后面跟着进来的是戈里亚奇金。加比舍夫同我打过招呼之后，问我：

“关于强渡托博尔河，粉碎敌人方面，你提了个什么方案？”

我知道了，原来旅政委把我的建议汇报给师政委了。

师长和政委已经了解到，过去两天的战斗中，萨宗诺夫旅和斯特罗加诺夫旅所属各团连连失利，伤亡较大。因此听到我的建议后，很感兴趣，立刻要我具体讲讲。我把向旅长斯特罗加诺夫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师长听了之后，连说我这个建议没什么了不起。他说，我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团和我自己。看来，谈话只好就此结束。可是这时师政委加比舍夫又出来讲话了，他直接了当地把问题向师长提出来：

“既然崔可夫硬要那样干，为什么不让他在自己的那个地段试一次呢？”

出于政委的坚持，经过简短的交谈之后，师长只好同意。他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奖品（一只刻着本人名字的金质手表）交给我之后，问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应该怎么支援我团行动，因为我們是在实现一次大胆的决心。

“既然现在全师已经停止了进攻”我说，“那么炮兵也应停止射击，炮兵应编入我团，听我调动。傍晚之前，要使炮兵与我的指挥所建立通信联络，我的指挥所在库尔干南部。师的炮兵主任要到达我的指挥所。我旅其余各团应做好充分准备，于明天早晨开始发展战果并扩大突破口。”

于是师长当即吩咐参谋作出相应的安排，不过，他老是有点不放心，他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当时我也一时说不准，到底具体什么时间发起进攻，我只说了一个大体的时间，或者在夜间，或者在次日拂晓。反正我保证在午饭前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当我离开师长返回时，有两个政委——加比舍夫和戈里亚奇金——挡住了我，把我请到师政治部，他两人好象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你到底能不能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我理解，这是同志式的关怀和担心。我于是回答他们，我这个决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要求他们不要让我在此地耽搁太久，因为进行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至于能否成功，那明天见分晓。

为了抓紧时间，我利用师里的通信枢纽，吩咐副团长布哈尔金先办好几件事：把全团从占领的地段上撤下来，夜间12时前带到库尔干城南；团司令部带领一个步、骑兵侦察队

和两挺重机枪迅速赶到那里。

我这次行动的基本思想是：靠突然性。因此我下令立即停止冲击，停止炮击，要给敌人造成一个印象，我们已经开拔了，再不能从这个地段上发动进攻了。当前我迫切需要的是，关于白军的情况，为此，我决定亲自出马。当然不是靠力气，而是靠智慧。

在库尔干城南的托博尔河上，我知道有一段能够使马匹徒涉的浅滩（攻打库尔干城那天，我就是从这过去的）。我决定把团指挥所设在附近。

我把师炮兵主任卡西莫夫唤来，给他交待任务：进攻中应将炮火集中在团的两翼，并且以炮火控制敌人的装甲列车，制止它沿铁路线机动。

卡西莫夫年纪较大，是个很内行炮兵指挥员，此人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并不因为接受一个年纪轻轻，嘴上无毛的青年指挥员下达的命令，而感到难为情，他接受任务十分认真，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并准备在这次战斗中亲自组织炮兵火力。

这时，骑兵侦察队和步兵侦察队均已到齐，还带来了专为我准备的一辆马车。我换上白卫军少尉的军服，我的传令兵打扮成一个上等兵的样子。这种服装，是我们的侦察员在俄罗斯——卡拉博尔卡粉碎高尔察克军队时得到的。准备停当之后，我们的侦察兵带着两挺机枪，与“白军少尉”一起渡过了托博尔河，同时我也把步兵侦察队拉到渡口。

在托博尔以东 3 公里，两个山丘之间的灌木丛里，我们的骑兵侦察队急速奔驰着。

我与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沿着枯干无水的河岔直奔白